

澳门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

王 敏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 济南 250021)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0)01-0093-04

16世纪,葡萄牙人入据澳门后,澳门成了中国最早的接纳西方科学文化的商贸港埠。长期以来,澳门不仅有着维护祖国主权、英勇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光荣传统,而且由于特定的文化环境成为中国近代社会酝酿变法图强、传播维新思想的一个策源地。像林则徐、郑观应、康有为等不同时期的维新派人士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澳门都进行了各种考察研究及革命宣传活动,这些活动波及影响到中国的政界和思想界,对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代先驱者在这里开眼看世界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与“鸦片”这个污垢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前后,英美等国向中国倾销鸦片的数量年年剧增。鸦片的大量入侵,导致了中国社会矛盾的日益复杂化和尖锐化,清王朝进入到最衰败的时期。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19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改良先驱者,即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他们猛烈抨击封建制度的腐败,呼吁改革弊政,查禁鸦片,抗击殖民主义侵略,同时主张学习西方长技,开眼看世界。林则徐被称做“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社会政治思想最突出的是强国御敌的爱国反侵略思想,他的辉煌政绩主要体现在受命钦差大臣期间的坚决查禁鸦片及抗击英国入侵者的斗争上,“虎门销烟”的豪壮,阻击入侵者的凛然,林则徐谱写了近代中国第一曲爱国反侵略斗争的激越华章。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期,恰恰也是他开眼看世界、坚定富国强兵信念的重要时期,林则徐义无反顾地进行禁烟斗争及所采取的深得人心的经济策略,正是他反复调查研究、知己知彼、运用“以夷制夷”战术思想的结果,而澳门是他了解敌情、研究西方、观察世界的第一个渠道和窗口。此间,林则徐不仅派专人坐探澳门,还从澳门购得大量外文书籍和报刊,请人节选翻译,详细研究,除了解禁烟事务外,还将报纸上有关中国的时事、评论、通商贸易及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一一摘译,按时间顺序编订成册,取名曰《澳门新闻纸》^[1]。《澳门新闻纸》编有六册,这对明了当时的形势、指导禁烟及反侵略斗争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报纸就有这样的分析:清朝官府向来“骄傲自足,轻慢各国蛮夷,不加考究。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送。”^[2]另外,他还广泛涉猎西方其他的报刊专著,分类摘译编纂成《华夷事略》《各国律例》《四洲志》等书作,运用先进的资料信息手段,为中国打开封闭之门,观察了解西方,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

1839年9月3日,“虎门销烟”的三个月后,林则徐、邓廷桢一行亲赴澳门巡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一级中央官员对澳门的巡视,目的是巩固禁烟成果及视察澳门防务。此行一方面沉重打击了英国商贩在澳门的不法活动,维护和强化了中国政府对澳门的管辖主权,另一方面也增强了不同地域间的政治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考察认识。林则徐、魏源等人力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富民强国,表现了进步政治思想家的远见卓识,可谓开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河。1997年11月5日,澳门莲峰庙广场南侧的“林则徐纪念馆”落成开放,馆内塑有林则徐半身塑像,塑像两旁陈列着他销毁鸦片的奏

折手迹,澳门人民将这位有胆有识、放眼世界的民族战士永远地留在了新时代祖国的开放前哨。

郑观应于澳门写出变法力作《盛世危言》

19世纪后半叶,中国萌生了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出现了以王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具有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郑观应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广东、上海及香港、澳门地区,特定的西学东渐的氛围对他们影响深远。郑观应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雍陌乡,幼时随父亲在澳门接受启蒙教育,青年时期到上海宝顺洋行轮船公司任职,此时开始学习英文,并“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3],打下了西学及经商发展民族资本的基础。自1862年,他开始在上海的《申报》及香港的《循环日报》《华字日报》等发表政论文,抨击时弊,主张变法救国。1873年他出版了《救时揭要》,揭露西方列强贩卖人口、夺我利权等罪行,提出要“寓兵于商”,发展民族工商业,70年代末又撰成《易言》一书,最早阐述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提出以议院制取代君主专制的改良方案。在甲午战争之前,郑观应是明确主张在中国实行议会政治的最激烈的人物。中法战争期间,郑观应毅然辞去轮船招商局总办职务,去广东总理湘军营务处投身抗法斗争,曾在西贡、暹罗、金边、新加坡等地进行一些联络发动工作。1885年初,郑观应受命去香港租船运兵,援台抗法,被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借故拘禁扣押。摆脱羁留后,郑观应隐居澳门的郑家大屋,倾其心力编写维新变法的巨著《盛世危言》。《盛世危言》5卷本于1893年出版,这部皇皇论著刊行后震动朝野,总理衙门特印两千部分发众大臣阅览,各种版本翻刻发行达10多万本^[4],对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郑观应积极参与民族商业经营,创办实业,成功地进行了多种管理、资本投资、商贸等活动,从洋行买办转为颇有名望的民族资本家,得到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的赏识,李鸿章曾先后委以多项官商职务。郑观应的洋务经历、对西方各国的考究及突出的爱国政治热情,使他突破了洋务官僚“逐末而舍本”的局限,他尝试用开放的视野、比较的方法,研究和看待中国与西方,如《盛世危言·自序》所讲,“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弊得失盛衰之由”,得出的结论是:“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兴学校,广书院,人尽其才。因此,效法西方的议会政治,重视教育和发展民族工商业,是郑观应变法救国思想的核心,《盛世危言》多方面地阐述了这一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部富有启蒙意义的变法著作。毛泽东在延安时同斯诺的谈话,曾两次提到《盛世危言》给予他的影响,这是少时的毛泽东读到的第一部讲西学新法的书,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及恢复学业的愿望^[5]。另外,作为在澳门很有影响的改良派代表人物,他曾与孙中山有过一些交往,还力荐这位“留心西学”、“其志不可谓不高”的青年,望能实现上书李鸿章促其变法救国的政治宏愿^[6]。晚年的郑观应经营不济,多居澳门,笔耕著述,增编《盛世危言后编》16册,1921年在上海刊行。

康有为、梁启超等将澳门作为维新派在华南活动的基地

伴随一次次战争所带来的深重的民族灾难,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维新政治思想家又在中国奏响了救国图存的强音。救国图存的核心依然是变法,在变法问题上,他们既超出了洋务派单纯学习西方技术的范围,也突破了前期维新派思想理论不够系统完整、缺乏具体实施纲领的局限,明确阐述了全面效法西方、尤其要效法西方的议会政治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动纲领,希望当权者能够接受他们的主张,由上而下地实行变法维新,通过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避免发生大规模的农民革命。1895年春,时值中日甲午战争末期,一起“公车上书”事件拉开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治维新运动的序幕。

康梁等人都是国学根基深厚而又接纳大量西方文化、决意向西方寻求救国途径的激进分子。康有为雄心勃勃,他设立学堂,培训弟子,著书立说,同时直接上书皇帝,陈述其变法主张。他曾七次上书皇帝,著名的“公车上书”是第二书,虽然这个策划最后未能兑现,但这份万言书在北京政界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之后,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广开言论,主持创办了《中外纪闻》^[7],由梁启超、麦孟华主编,每月一册,免费送朝官阅览。这是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刊物,表明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自觉地组建自己的宣传阵地,配合变法大造舆论。接着,维新派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发行《强学报》,在广西创办圣学会,发行《圣学报》,当京沪强学会被封闭后,1896年8月,康有为督派梁启超创办了上海的《时务报》。《时务报》全

面阐述康梁维新变法主张,文风明快犀利,慷慨激昂,很快在全国名声大噪,销售数量达万余份。

同年底,康有为及胞弟康广仁等抵达澳门,与这里的维新派人士刘桢麟、富商何廷光等人相聚,商定创办一份澳门的“时务报”,将此作为维新派在华南活动的基地。1897年2月,维新派的又一报刊《知新报》便在澳门创刊出版,这份由康广仁、何廷光为经理,由梁启超、徐勤、刘桢麟、何树龄等8人为主要撰稿人的报纸,以奋力呐喊的姿态,系统阐述维新变法乃大势所趋,宣传西学西政,呼吁清政府变法图强,刊登各报不敢刊登的京外近事、各国新闻,抨击列强侵略,很快形成了新的维新思想的宣传阵地。《知新报》的强劲宣传不仅使变法思想在澳门深入人心,而且与上海《时务报》稍后的天津《国闻报》(严复等创办)、长沙《湘报》(谭嗣同、唐才常等创办)一起,被列为最受全国变法维新人士重视的几大报纸,小小的澳门成为可以与上海、湖南等地相媲美的维新派活动最为活跃的区域。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惨遭杀害,全国形势逆转,清政府下令关闭了内地所有的维新派报馆,唯有《知新报》由于澳门的特殊环境而得以生存。《知新报》不畏清廷权势,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主张,连续刊发康有为等人为推行变法所写的奏折、文章、书信,《北京要事汇录》、《论中国变政并非过激》、《八月六日朝变十大可痛说》、《上那拉后书》、《讨罪发微》、《贼臣祸国痛言》、《清国殉难六士传》等连载,评论,旗帜鲜明,激昂慷慨,揭露朝廷政变之黑幕,为死难者悲愤惋惜,要求清政府继续推行新政,变法救国。《知新报》此时卓而不群,一枝独秀的不凡表现,深得国内外进步人士的赞赏钦佩,也是它最具光彩、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可是不久,随着政局的发展,康梁政治改革的不彻底性逐日暴露,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知新报》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确定为其宣传机关,不久保皇会总部迁至澳门,经过了短期的沸扬之后,《知新报》逐渐消蚀了昔日的战斗精神,于1901年初自动停刊。

总的来讲,澳门《知新报》历时近四年,是办刊时间较长的一份纯维新派报刊,宗旨是倡导维新变法和拯救危局,在国内及海外有较大影响,其历史的进步意义是十分突出的。

孙中山由澳门走向世界,走向革命

经历了政治改良的失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已成为大势所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孙中山曲折的革命生涯中,澳门是这位民主革命先驱者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是他认识世界的窗口,也是他走向革命的起点。

孙中山的出生地香山县翠亨村与澳门近在咫尺,父亲曾在澳门学艺谋生,1878年,12岁的孙中山跟随母亲第一次来到澳门,中西交汇的澳门给少年的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初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遂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8]。5年之后,孙中山经澳门到香港读书,度过了9年的读书时光,逐渐萌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孙中山不仅取得医学专业的优异成绩,而且博览群书,广交朋友,研讨革命道理,探求济世救国之路。他与志同道合的几位朋友陈少白、尤烈、杨鹤龄等人时常往来聚会于香港、澳门之间,针砭时弊,言论朝纲,放言革命,人戏称“四大寇”,杨鹤龄在澳门的住所便有了“四寇堂”之谓。这段风华正茂、探求真理的岁月令孙中山一生难忘,在《建国方略》这部巨著中他回忆道:“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不以为欢,数年如一日。”1891年,孙中山毕业后应邀到澳门镜湖医院出任新设西医局的首任义务医师,成为当地的第一位华人西医。在澳门,孙中山迈出了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第一步。

孙中山在澳门行医仅近一年的时间,却因其赠医送药、不受分文且医术精明、医德高尚而名声鹊起,享有“镜湖耀彩”的殊荣。这期间,他开始进行革命思想的传播与社会变革活动,发表于澳门报纸的《致郑藻如书》一文,是迄今发现的孙中山最早的政论文章^[9]。1893年7月,孙中山与葡萄牙友人费尔南德合作,创办了中葡两种文版的《镜海丛报》,孙中山主理中文版。《镜海丛报》发表的社论,评说大多言辞激进、泼辣精悍,所署笔名“黔上味味生”据查证为孙中山早期笔名^[10]。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了“兴中会”,次年回到香港,建立了香港兴中会,随后即在广州策划起义,却因组织不严而失利。此时的《镜海

丛报》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动,报纸登出组织广州起义的“电讯”,全文刊发了孙中山在起义前发表的《农学会序》,并介绍了孙中山的活动事迹。《镜海丛报》是近代中国第一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密切相关的报纸,在澳门、香港及内地的广州、佛山、福州、厦门、上海、北京等地发行,国外发行到葡萄牙、旧金山、横滨、马尼拉等地,由于早于维新派所办其他报纸,故颇为引人注目,起到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舆论准备的积极作用。

首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经澳门脱险,流亡海外 10 余年。1905 年,游历考察了美国及欧洲几国的孙中山回到日本,联合华兴会等组织创立了“中国同盟会”,确立了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目标。同盟会在国内及海外设立支部,支部以下按省设立分会,组织革命活动。孙中山遂委派冯自由、李自重等人赴粤港澳进行宣传发动,1909 年冬,澳门“同盟分会”宣告成立,会长先由香港分会会长谢英伯兼任,后由林君复接任。澳门同盟分会依照孙中山的指示,确立了两个工作重点,一是加强革命文化宣传,二是发展武装力量,策动武装起义。分会组织了“优天影澳剧团”,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宣传活动,请富商卢怡若(亦为同盟会员)出面,申办了“濠镜阅书报社”,供读者借书阅览、切磋交流,发展会员,另外还设立了一所西式学校培基学堂,经常请香港分会会员举办演讲,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此同时,澳门同盟分会通过各种发动工作,把不少支武装力量包括清朝驻澳新军、驻守香山的防营、团练等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确定了举行“香山起义”的重要行动计划。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局面迅速蔓延,澳门同盟分会的起义计划也进入到关键时期,当负责联系军火的林警魂千方百计从海外购得了武器,又巧妙地利用“内线”运回澳门转送到香山后,香山起义便于 11 月 2 日在小挑打响了。起义军在澳门民众的支援下,势如破竹,5 日攻克香山县城,在广东引起很大反响,各地起义军相互呼应,两天后就光复广州,迫使广东“谘议局”在 12 月 9 日宣布“共和独立”,并请出香港同盟会的名人胡汉民就任都督。香山起义军改编为“香军”,进驻广州西关,在后来的北伐战争中,香军又被编入广东北伐军,一路挺进到江浙等地^[1]。澳门同盟分会在孙中山的故乡发动的这次起义,有力地推进了辛亥革命在广东的发展,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于 1912、1913 年两次再到澳门,广泛会见澳门各届人士,受到热烈欢迎。后次抵澳,孙中山还与当时的广东都督陈炯明在澳门海面会晤,促其共行“讨袁”大事。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中,孙中山依然把澳门作为从事革命斗争的重要场所,他指派的中华革命党人亦以澳门为基地,组织了一些颇有声势的革命活动。1925 年,孙中山逝世,澳门两万余民众冒雨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哀悼会,沉痛悼念这位慈善、博爱、坚毅、顽强的革命先行者,表达他们对所熟悉与爱戴的卓越人物的深厚感情。1958 年在澳门辟成的“国父纪念馆”至今蜚声海内外,它展示了一代伟人于此留下的历史足迹,也寄托着澳门人民对孙中山由衷的景仰与缅怀之情。

参考文献:

- [1] 见徐松荣著《维新派与近代报刊》第 33 页,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 [2][3] 见涂鸣皋主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家评传》第 30、184 页,重庆出版社 1988 年版。
- [4][5] 参见李锐著《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 42、41~44 页。
- [6][8][9][10] 参见邓开颂等著《澳门沧桑》第 123、131、133、133~134 页,珠海出版社 1999 年版。
- [7] 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第 361 页,红旗出版社 1982 年版。徐松荣《维新派与近代报刊》撰述:《中外纪闻》系《万国公报》的易名,先有《万国公报》后有《中外纪闻》;另,“根据陈炽的建议,先办报,后举会”,“《万国公报》创刊后,着手组织强学会”。参见该书第 60 页。
- [11] 参见王俊彦著《澳门的故事》第 400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

作者简介:王敏(1954—),女,山东金乡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玫文